中国家庭教会对文化和处境化的思考

序

中国家庭教会处境艰难，这是不断见于媒体的表述，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家庭教会处境化的状况。但艰难仅仅是表象，在中国大变动的年代，结束文革，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全民致富的大背景下，家庭教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不能用暂时的或时不时的苦难掩盖巨大的成就。
作为地下教会的家庭教会的巨大发展，是神手所为，他借着宣教士、牧师、传道人这些仆人忠心舍命的侍奉，甚至借着管理当局的压制，看顾保守着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坚立不倒，让教会传讲真福音，让信徒有真信仰。

家庭教会的定义

- 原初的家庭教会

耶稣升天之后，初代教会在信徒家里聚会，可以看做是家庭教会的雏形。

见使徒行传：2: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2:47赞美　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在基督教史一书中写到：“外邦人教会的增长带来许多变化，尤其是崇拜生活的变化。在基督徒被作为冒牌犹太人赶出犹太会堂之后，他们开始在私人家中聚会，至少会在星期天举行圣餐聚会”[1]。

后来基督徒为躲避逼迫，在地下墓穴或者墓地聚会，但他们更加频繁地在私人家里聚会，（前书 p110）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整个受逼迫的年代（33-313 年），直至君士坦丁归信，并且家庭教会一直存续至今。

-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

以下内容见维基百科—中国的地下教会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基督新教、天主教必须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动，并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管制与干涉。1950 年 7 月，中国基督新教界的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宣称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

[1] —见《基督教史》上卷，第四章，31 页。作者胡斯托 L 冈萨雷斯，上海三联出版社

主自办的道路。

此项规定引起了相当部分基督徒的抵制，他们认为，教会的领袖应该是耶稣基督，而非顺从某个世俗政权。部分不愿接受政府管制与干涉的新教教徒在政府登记场所之外的场地开展宗教活动，他们多在信徒的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开展，所以中国新教地下教会也被称为“家庭教会”。

对于家庭教会有不同的模式，在张路加的《海归基督徒与今日中国家庭教会》（2011 年）一文中，他提到中国家庭教会有三类非常典型的发展模式：

1.“北京模式”

(1)“串联”、“并联”现象明显。所谓“串联”，指的是一位或数位专职的传道同工，带领十几个聚会点，形成垂直型的牧养管理机制；所谓“并联”，指的是不同教会之间的“水平连接”，或是一间教会分植出多间教会后，平时各自独立运作，但时常有传道同工间的联席会议，及事工方面的合作。

(2)教牧同工大多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神学方面的装备。许多同工毕业于高等院校，放弃了很不错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委身神的呼召，带著强烈的使命感，并藉由许多地下神学院或网路神学院等，接受了较系统的神学装备。有些人甚至是在海外接受神学装备后回国服事。因此，教会同工的属灵视野及神学素养，和过去相比，有很大提高。

(3)教会成员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白领，在各行各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福音进入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力量。

(4)对中国教会前面的建造和方向，这些教会也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思考和实践；对福音如何有效进入文化，信仰如何在中国真正扎根，基督徒如何回应时代挑战，以及诸如“后现代思潮”、“公民社会”、“绿色环保”、“政教关系”等，也开始做出思考和论述。

2.“温州模式”

除了在本地区有快速发展之外，还藉由相对严密的组织结构及中央系统，统筹协调各项事工。特别是外派工人至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处宣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也开拓出了一套深具特色的教会发展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在教会人力、资源的整合及全盘统筹方面，特别是推展宣教事工方面，有相当的力量和效果。

3.“珠三角模式

在珠江三角洲，有著大量从农村来的打工的人，加上当地特有的民情、风俗，而发展出了“民工教会”、“阿姨教会”，或是“企业老板教会”，甚至“公安教会”等。

于建嵘 2008 年的一篇关于家庭教会的演讲今天看来还有其借鉴意义。[2]

经过 10 年的发展，中国家庭教会在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型、集中敬拜教会式微，小型聚会、不断植堂模式有所发展。随着新的《宗教事务条例》（2018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生效，随后各省也做了立法。一些教会进一步分散，采用小组方式聚会。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隔离措施使许多家庭教会转向线上敬拜。

- 其他国家的家庭教会

可以讲凡是对于基督教宗教信仰自由有限制的国家都有家庭教会的存在。信仰不能成果公共生活的后果就是基督徒以自使徒时代即开始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满足敬拜神、擘饼分别的需要。

处境化和文化

提摩太 凯勒在《21 世纪教会成长学》中对于城市教会的处境化和文化有极为出色的描述。他首先阐述福音是什么—圣经中的福音，不是好建议，而是关于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之工作的好消息。福音是好消息，宣布我们已经获救；福音是关于基督耶稣做了什么，以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福音有两个敌人—宗教和无宗教，或者律法主义和道德废弃论，或者称为道德主义和相对主义。福音是关乎我们始终的好消息，福音对应着回答了：【创造】我们从何而来？—从神而来，独一而重视关系的神；【堕落】事情为何演变到这种地步？—因为罪的缘故；辖制与定罪；【救赎】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基督；道成肉身、代赎、恢复；【信心】我们如何能回到正路？--透过信心；恩典和信靠。这四个篇章整个内容构成了福音叙事。

在阐述完福音是什么之后，凯勒接着以城市为主轴来处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试着在一味批评文化（基要派）和一味欣赏文化（自由派）两个极端中，寻求一个忠于福音的平衡道路。在社会文化经历剧烈变迁之际，神学处境化的工作变得格外紧要。处境化的工作像是搭建桥梁；圣经在一端，文化在一端。我们需要在这桥上双向同行，透过传讲、聆听、再传讲、再聆听的过程不断修正。在处境化过程中，圣经和文化不是对等的，圣经是至高的，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要原地打转，而是螺旋向上，在过程中对于神的话语有越来越清楚和正确的认识。体会福音对特定文化的影响，并分辨该如何想这个文化传递圣经的信息。针对不同文化，凯勒提出“钻孔--爆破--影响”的处境化模式，这是一种对文化的平衡观点，既不是一味肯定，也不是一味否定。[3]

健全的处境化，意味着针对特定的文化，转化并调整传达福音的方式及事工模式，却毫不减损福音本身的要素和特质。也就是要针对一些人生的问题，要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和

[2] 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2008 年 12 月 11 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3] 【以上引自《21 世纪教会成长学》导读部分，作者董家骅】

形式，给人“圣经的答案”。

文化是什么？按照对光的定义看待文化，沿着最广最大的范围来对应它，文化应该包含我们世上生活方式的每一个层面，而不仅仅是狭义的语言、音乐、艺术、食物与民间习俗。巴尔尼形容文化犹如洋葱，一层一层地，从世界观到价值观，到人为制度，到人类习俗与行为。虽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都不够充分描述文化的复杂性，其内容的密切和深厚的关系。但重点在于，福音在一个文化里的处境化，必须涵盖从你的行为到世界观的全面改变。

处境化既无可避免，又容易陷入危险。处境化的危险是宗教融合，拒绝圣经具有完全的权威，而任意在它各样教导之中挑选合意的部分，企图制造一个乡愿、不得罪人的基督教。自由派神学在应当挑战文化的时候归顺了文化。他们按照自然主义的说法重新定义所有的交易，以顺应每样事物必定有其合乎自然与科学的解释。

一、 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

在《21 世纪教会成长学》中提出了很多文化问题。中国城市的文化有和书中提到问题相同或类似的，也有不同的问题。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值得深入讨论和仔细推敲的。基于本土家庭教会研究的不系统化，造成我们常常流于空泛和表面，未能深入实质。

我们下面以硬处境和软处境来分析中国家庭教会的文化环境。总体而言，中国家庭教会最主要的处境是法律和监管环境对于家庭教会合法性的否认，包括基督徒在内全体国人对于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目标的追求，以及半个多世纪无神论的宣传、灌输和洗脑所致的对于信的恐惧。至于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在城市中已经沦为摆设，城市的主流文化就是忙碌于谋生。

(一) 家庭教会和成员硬处境

1. 法律监管

法律监管以前面提及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为主体。前者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实施后各省先后出台地方性法规相应配套。

《宗教事务条例》对于城市家庭教会的重要影响是要求进行登记，否则予以处罚。包括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责令停止日常活动，改组管理组织，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可；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各省的《宗教事务条例》对于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家庭教会一般不选择按照条例进行场所登记，因此均处于不合法状态。

《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4]是基督教全国两会制订的，是两会对于中国教会处境化的行动纲要。开宗明义，在第一部分就明确了主要目标是:

“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理念，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

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高举基督、保守合一的教会；一个忠于圣经真理、扎根中国文化以及具有处境化神学领受的教会;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生活见证生命的教会;一个与各国各地教会圣徒相通，为普世教会做出独特贡献的教会，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

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中国教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殷切期望。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强调做好宗教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时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不断增强与当代中国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建立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与祖国荣辱与共、与人民相濡以沫的感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共识。

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同我国发展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立足圣经教导，持守基本信仰与核心教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坚持合一方向；兼顾教会的普世性和地方性，借鉴普世教会的信仰实践、灵性经验和神学遗产；融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积极融入社会。“

从这篇重要的纲要中可以窥见官方对于基督教会中国化的目标就是与国家的治理目标和口径保持一致。若官方将这个目标在家庭教会中推行，会引起更多的冲突，以至于造成家庭教会无法立足。

家庭教会没有合法性问题,许多教会希望通过引用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来对抗下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但实践上这是行不通的。一定程度上讲宪法目前在中国还不是硬法—即直接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引用作为司法和执法的依据。因此,抛开现行法规讲合法性是一种“法律意识”不足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缺少常识。当然，在发生一些针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时，拿宪法作为保护是增加管理当局压力的方式。在有正当性、合理性而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教会，如何保护信徒，是家庭教会始终面临的严重问题。从这种意义上看，管理当局对待家庭教会还是比较宽容,没有真正地执行前述法律法规。这点应该成为一点基本的判断。

2. 三座大山，生存艰难，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家庭教会第二个环境我认为是巨大的生存压力。不论是巨富还是赤贫，都觉得自己有生存压力。我们转眼看普通人，作为教会主要信徒的人群，都自感生活压力巨大。生活压力面前,重要性排序就发生了变化。一个清教徒家庭的敬虔主义—神是第一位的,特别注重礼拜，主日全家两次参加教会敬拜；重视家庭责任秩序，丈夫和父亲是全家的头，不仅负责养家糊

[4] 见基督教两会网站

口，更重要的是以爱心和智慧担任全家属灵的领袖，按照圣经的吩咐教训孩子，带领全家敬拜。这样的场景或者敬虔主义较难同样的实行[5]。中国基督徒家庭常态是夫妻二人都全职工作，家庭次序会因为挣钱多寡而发生争夺，收入高的女方也许认为自己是家庭的头。
生存压力造成人不喜乐，常常忧愁；对于教会活动，特别是礼拜之外的侍奉，祷告会、查经小组、探访等参与不足。同时，因为房租、工作地点变化、大城市房价巨贵，社会保障不足，户口问题导致的孩子一旦进入高中必须回老家上学等等，造成平信徒流动性强，重压之下，倍感时间缺乏，委身一个教会一生或者长期委身，成为需要诸多条件支撑的大事。相应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充分地传达真理，是家庭教会牧者和传道人面临的考验，如何有效喂养和关心信徒，增强他的信心，在暂时的生存和属天的永生之间建立桥梁和平衡，是一个切近的问题。对于世界的追求，会造成基督徒生命的割裂，平日里忙于工作、家庭，主日里忙于敬拜和神修复关系。如此循环往复，造成生命成长的拖累，生命更新的凋零。不如此当如何呢？
教会对于讲道内容录音，供信徒平时收听也许是一个办法。教会定期结集印发传道人的讲章，也是一个办法。无论如何，用真理装备信徒，让信徒更深切、真实地交托和信靠，而不是自己苦苦挣扎，在生存压力里面不可自拔，是特别重要的。[6]警惕成功神学在这方面的误导。教会按照圣经教导信徒正确看待财富，量入为出，不参与高风险的信贷业务，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都是需要的。

3. 互联网及网络游戏

2020 年是互联网诞生 51 周年，新周刊官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互联网才是最伟大的发明，别把它毁了》。该文中正确地提到：没有哪样科技发明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汽车缩短了距离，电话改善了沟通，但都没有互联网那样无远弗届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中进一步提到手机已经变成了人的“器官”。

抛开复杂深奥的分析，互联网的便利的媒体和娱乐、社交功能，已经占用和充满了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挤压了正常的时间。正常的时间应该是工作、家庭服务、家人互动、锻炼身体、与朋友交往、探望父母、学习以提高知识和能力等等，但互利网已经成功地战胜了人类自以为重要的正事和世代养成的勤勉上进的习惯。上网浏览是当代人最大的时间杀手。信息提供者通过大数据投人所好，不断喂养感兴趣、关注的信息，造成看的越多，思想越偏狭。信息围栏使羊看不到天空。精心设计的广告促销，各式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电商，每天都在诱惑你下单购买，为消费主义盛行推波助澜。剁手党已经进入到成瘾的程度，不断陷入超前消费，冲动消费，购买无用东西的心痒难耐，痛悔，然后再来一轮的循环之中。
说起成瘾，网络游戏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普世游戏。与熟人或者陌生人的网上对战，成为许多人在下班之后的必修课。这里面有时间问题，也有价值观和世界观问题。网络游戏的设计就是让你成瘾。无论网络游戏多难，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购买装备，都会取得成功，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也是现实世界的游戏—体育运动、智力运动所不能比的，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更容易成为英雄，取得伟大成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痛快淋漓地杀戮、欺骗、伤害。即时通讯工具就要替代电话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练习的即时性，使人没有空闲和自由，处于

[5] 见《清教徒之约》，上海三联书店，王志勇译注，p16-17，另见《入世的清教徒》一书。
[6] 圣经和合本，太 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 6: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惶惶状态。

上述互联网技术进步，生态发展的后果有几点影响了基督徒的敬拜和传福音的果效，1、没有时间。有时间上网和玩游戏，没时间读经、祷告；2、恍惚，信息爆炸的结果让读者从心理到胜利上产生激荡，甚至有对于大脑和器官的器质性伤害；3、与生存压力相反，互联网消磨时间的同时也减低了工作时间，因此会造成收入的减少，这对于家庭生活、教会奉献的影响都是直接的；4、信息的多元化，时间被占用，奶头乐，得过且过，不关心永恒问题，对于接受福音的愿望不足。等等等等。

4. 教育机会

户口造成了在当地没有户口的孩子升学问题，只能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对于基督徒家庭，面临教育问题不仅如此，如何培养敬虔的下一代，而不是被世界掳去？
教育变得迫切而实际。教会学校的建立，给信徒教育孩童开了重要的道路。可以见到的都是凭着信心开始建校，然后困难重重。在各样立法的交叉网格里面，教会自办的学校显然没有“合法性”。因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于办学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极其有意义和重要的。教会学校无论是在培养神国的选民，还是为未来的教会预备牧师、传道、长老都是必要的，尤其在一个信仰不够自由的国度里面更是如此。正像现在对于校外教培机构的清理，并不能让负责任的父母不想方设法辅导孩子功课一样，教会不能放弃为未来预备工人，完成基督耶稣交托的大使命。
教会学校的学生未来也许不都是全职服事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的课程要使他们具备同等公立教育的水平，比如—表达：写作能力、演讲能力、外语；基础的理化知识，编程能力；对于某一专业知识的掌握，如法律、会计、理工科等；体魄，运动能力等。在《基督教教育》一书中，沃格拉牧师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基本原理有清晰的表述[7]：基督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独一无二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 目标 1：基督教教育是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对人的命令）。
- 目标 2：基督教教育是为了教导真理（上帝的圣言和作为）。
- 目标 3：基督教教育是为了增进孩子各方面的福益。
- 目标 4：基督教教育是为了增进社会的福益。

5. 科学发展、技术创新及创业

互联网、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被称为新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面前，总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的是人会因为这些技术进步而寿命延长，生命质量提高。悲观的人则认为人工智能在带给人巨大的便利，替代人劳动的同时会使人类失去意义，人类某一天—奇点—就会在智力、体力等方面被人工智能全面碾压，人工智能会认为人类没有意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人类目前如何看待蚂蚁一般。
这是更深沉的生存忧虑，马斯克的办法是将人类移民火星，但我无法想象火星文明能够不采用人类最新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机甲勇士是否能够战胜硅基人类？
迷信科学，不能信仰，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信主的最大障碍。创业企业家们倾向性就是自由主义，所有的创新都是颠覆，创业就是重新划分市场和疆域，甚至降维打击，如同电商打击了

[7] 《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店铺，支付宝和微信打击了小偷和银行柜台和柜员机。创业竞争的逻辑就是颠覆、竞争和成功，为此，企业家群体信主问题变得愈发困难。
教会如何引导信徒正确看待神的恩召和恩赐，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动性和神的预定？证道常常刻意回避这个领域，是多数的选择。我也看到那些积极参与创业的牧者，总感受到一种异样和违和。无论如何，回避都不是办法，对于创业的基督徒的属灵喂养，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6. 突发疫情等公共卫生时间采取的强隔离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中国和世界特别深远的变化，关键词就是隔离。各种跨地域的交通被人为阻断，出出入入都要扫码测温戴口罩。
可以讲这是二战之后人类大家庭以地域隔离的最严重的情形，在战争期间尚能徒步穿过火线，在疫情期间，如果你没有必备的几大样可谓寸步难行—健康码、体温、核酸证明和口罩。先是找特效药，后来是转向研发疫苗。跟随着疫苗有无数的谣言。要么刺突蛋白如何，栓塞如何，影响生育等等。
抗疫是头等大事，教会的礼拜于是乎线上、线下不断调整。线上敬拜的好处只有一个，能够学习牧师和传道人领会的经验，余下的几乎都是缺点—如不按时敬拜，敬拜时不严肃认真等等。尽管如此，那些线上敬拜的录音还是宝贵财富，可以反复收听，深入思考。
针对这种情况，培养更多的工人在各处家庭小组交通分享尤其重要。灵活地建立各个堂点服事岗位，招聚更多同工服事，鼓励学习神学课程，为隔离情况不能大聚会做好补充。西罗亚堂许多同工都是从厨房爱宴服事开始，进而领会和代祷服事，甚至成为执事。爱就是付出，投入越多，感情越深，进一步的投入也变得自然而然。不服事的信徒生命状态容易停滞。高老师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上课时讲到：“一旦放弃服事，就丢了许多属灵的福分，把长子的名份让了“。至为恳切，可以用切中肯綮这个成语。
如何做好线上敬拜？有的教会采用敬拜小组视频方式，能够起到互相监督作用。把赞美诗唱好，特别重要，当我们站在会众中跟着唱的时候感觉不到参差不齐的歌唱的违和，但听录音时则非常不同。

(二) 家庭教会和成员的软处境

1. 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的表现是如果说话，就说正确的话，否则就不要说话。在这个前提下，和中央政策、领袖言论不一致的表达，都是不正确，都是危险的。为了自保，沉默与放弃表达。
相应地，基督教信仰常常处于不正确的境地。
教会领袖是否要对于公共政策进行表态？在证道中是否批评或者表扬时政？
政治正确至少带来两种严重的后果，其一是对于这个领域的问题不再思考，或者全信，或者漠视。有一篇文章《关心政治的人值得深交》，讲不关心政治的人是有问题的，“关不关心政治，也可以体现你的良知，学识，诚信，善良和年轻有为。[8]”其观点值得玩味。不知为何这篇文章已经被屏蔽了。

[8] https://www.sohu.com/a/219231946_713550

其二是带来割裂。国人，不论亲朋、同事，都可能因为政治观点而反目。这种情况使聚会吃饭变得微妙敏感。

2. 无神论与怀疑主义

承前面提到的政治正确，70 年的无神论教育的结果是国人在面对神时属实为难。
即使是无神论是基底，但这些年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却一直在变。变化的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不思考和什么都不信。在这个基础上的怀疑主义是最浅表的—我凭什么信你？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这样，大众就不知不觉地滑入了相对主义（辩证）的泥潭，这也行，那也行，不要较真，难得糊涂。

3. 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娱乐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是物质主义的注脚。现在看新闻网站，充斥着金钱的味道，到处传扬的是财富英雄的故事。有一种感觉，万般皆下品，唯有发财高。努力发财，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奇妙的是，与老一辈拼命挣钱对应的是年轻一代追求消费、享受和娱乐。“今天的教会疲于应付社会上的各样的文化现象。一部电影流行了，信徒都在津津乐道……“[9]。以互联网（移动）为核心的大众娱乐，自娱自乐，包括抖音、短视频、图片分享等等，都占用了大量时间。享乐与娱乐不知不觉就陷入了“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而努力奋斗追求物质则高扬了“今生的骄傲”。
传福音时，深陷罪中之乐的人是无法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一种说辞是等我玩不动时就信。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打消担忧，谁知道自己的寿数几何呢？[10]
圣诞老人是圣诞节娱乐化的登峰造极之境。众多的青年男女在圣诞节带着圣诞帽吃吃喝喝，纵酒狂欢，载歌载舞，是圣诞前夜和圣诞夜的热闹景观。同样的，在“万圣节“大家也是热心打扮，喜气洋洋。娱乐化使历史的重大时间，比如耶稣诞生，变成了一个大众欢迎圣诞老人乘坐麋鹿来送礼物的节日。在这方面，迪士尼动画片早就走得很远了，他们用很多作品来刻画那个圣诞老人。
物质主义—贪财的一个后果是对于传道人合理供应，奉献不足。以至于在 2011 年 5 月《教会》中《教会不给传道人合理供应是走十架道路吗？》开头就是“一把辛酸泪，神人皆痛心“。

4. 多元化

多元化在中国有不同的场景，可以从政治观点、两性关系、传统与现代、种族、民族、信仰、艺术等观察和分析。
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革命、颠覆、打破和革新。在《硅谷之火》这本介绍硅谷创业伟大历史的书中，讲到同时发生在加州的同性恋运动、反战运动等。各种另类表现在这个舞台上精彩纷呈，光怪陆离。
即使在强调品格的中国，同性恋已经是被默许，之前大行其道的娘炮文化可以讲是同性恋文

[9] 《教会、信徒与消费主义世代》，老漫，载于《教会》2011 年第一期
[10] 和合本可 8:36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8:37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化的某种展现。
要接受别人和你不同，这个观点在私人领域已经被认可为共识。对于他人的行为，不论是常态还是变态，不说三道四是有礼貌有教养有底线的表现，反之则被认为多管闲事。流动性和关起门来的心态，已经使社区、邻舍和亲人失去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这会使越界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多元化使教会的崇高地位跌落神坛，跌入土灰。也使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牧师传道人趋于不被充分尊重。这进一步凸显了教会在未来世界和未来中国的重要，末世已至，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要有许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5. 传统文化式微和新文化兴起，国学成为产业，中国人的忌讳

老祖宗的东西几千年传下来，都是好东西。这是国学家的说法。但不幸的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传统文化批评的书籍汗牛充栋，但作为中国人，仍然说着中国话，有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但无论如何，到今天，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可以列举一些：1、

6. 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崇洋媚外

7. 网络暴力与媒体关系

8. 本土化资源的供给不足

二、 家庭教会在处境化中的状态、选择和冲突

家庭教会参与处境（处境化）的三种选择

(一)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社会公平正义和教会公开化、合法化公开鼓与呼

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秋雨之福教会。杨雅各 2017 年的《当教会醉心政治，终将无力见证福音——华人教会政治化的两个当代样本》对此有所分析。当时王怡还没有被捕入狱。文章中写到：
“正在重走歧路的中国长老会
无论台湾长老会自己是否承认，但他们在众多台湾人眼中，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他们就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从前因支持“民运”而受逼迫，现在他们用政治势力来逼迫同性恋者。这一切，都与耶稣、十字架和福音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虽然因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而建立，被称为长老教会，是普世改革宗教会联盟的成员，受过逼迫，建立教会医院、教会中学、教会大学、神学院，也引用圣经批评世界，但她在世上所发的光有多少是来自那真光呢？
如果你同意这对教会来讲是一条歧路，那今天中国大陆的长老会也正走上这条歧路，而冲在最前面的，无疑是华西长老会，在华西长老会当中，又以王怡带领的秋雨教会为首。

首先，从政治处境和信仰实践来看，王怡的秋雨教会与 70 年代以后的台湾长老会有众多相似之处。

• 政治上都处于的弱势，没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台湾长老会处于国民政府威权时期，与之相对的是国民党扶持的“三爱教会”；秋雨教会的政治处境自不必多说，而王怡则反复强调自己是家庭教会的代表，与官方的“三自教会”不共戴天。

• 都处在社会转型的前期，政治环境尚不完全开放，但已有相当大的空间。从 1971 年台湾长老会首次发表《国是声明》，到 1987 年国民政府结束戒严，中间只隔了 16 年，这 16 年也是国民党威权统治式微的阶段。王怡也多次谈到教会如何回应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他不断地在讲台上批评政府，甚至直言习近平是邪恶的，但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要承认政府的影响力在减弱，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反腐和加强集权的动作，包括所谓“意识形态安全”，都反映出执政者面临的压力。现行体制的维系本质上是利益的捆绑，而非马列主义。虽然他的话语体系仍然是老的“阶级斗争”、“西方敌对势力”一套，但实际上的执政思路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维稳”思路，而非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消灭”。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出动大规模警力阻止秋雨教会“5·12 祷告会”、“64 祷告会”，却依然长期允许他们平静安稳地进行几百人的聚会，公开创办神学院、小学和大学。[11]”

---

[11]

王怡的二元史观放大政教冲突

从近期的王怡的动向来看，他所影响的秋雨教会、华西长老会已经逐渐呈现出一些解放神学、共产主义运动（其实这两者本来就有很深的渊源）的特征。

在 2017 年 11 月雅加达“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怡因受当局阻拦没有出席，最后是一位名叫陈彪的美国华人牧师替他宣读了《历史是大写的基督》。

王怡说，“作为创造主的基督，主宰一切。但作为救赎主的基督，却降卑至死。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上帝以祂的救赎之爱，给了世界一个空间，让世界上并存着两个秩序，一个是上帝的秩序，一个是魔鬼的秩序。这两个秩序反映在地上，一个是基督秩序，一个是法老秩序。”“从出埃及开始，上帝国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拓展，都与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帝国互相对应。”

“主啊，求你将未来的中国社会赐给你的教会，不然就带我离世与你同在。主啊，求你赐下大复兴给你在中国的教会，不然就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主啊，求你兴起一大批忠心于你的国、你的政权的仆人，去迎接前面新一轮的逼迫，不然就使他们失去会堂和会堂中的高位。主啊，求你拣选多得数不过来的宣教士、植堂者和布道家，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走遍中国的各城各乡，直到将福音充满中国的每一所监狱和看守所；不然就夺走我们的房产、学位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免得我们有一天仅仅拿着这些东西去见你。”

这便将整个救恩历史简化为“上帝与法老之争”的二元论，将世俗政权定为“敌基督”，并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何其荒唐!

王怡的圣经里面大概没有创世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和约翰福音，所以他不知道即使在异教君王的统治下，神没有把埃及交给约瑟，没有把波斯交给以斯拉，没有把波斯玛代交给末底改，但神的救恩依旧在进行。

约翰福音 18 章 36 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既然如此，为什么王怡牧师要号召基督徒以自取刑罚的方式，求神把中国社会赐给教会呢?

所以，我赞同陈鸽对王怡的判断，他是在“借神权挑衅政权”。

王怡的神学特征，与解放神学、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似之处在于:

• 将有形的政治体制视为邪恶之源，或魔鬼的代表。
• 将历史解释为二元的阶级斗争史——法老不除，基督难立。
• 以与邪恶体制的关系来划分敌友。
• 致力于在地上建立天国（共产社会或神权国家）。

……

远离奋锐党的酵，迫在眉睫

王怡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神学教育，2005 年受洗之后就开始站讲台，没有做过几天平信徒，神学装备都是通过自修。这不是要论断他是否得救，而是说王怡在教会内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他神学上的造诣。他的影响力的建立，是因为迎合了当代中国社会、教会中的政治诉求。

王怡是维权律师出身，又是宪政学者。在信主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家庭教会的维权案件。50 年代以

王怡的《论家庭教会传统和城市教会的公开化》，提到中心城市教会的四个时代性使命：其一、是自身真道扎根、教会建造与神学教育的祭司性使命；其二、是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帮助乡村教会结束政治逼迫、完成治理转型的先知性使命；其三、是从中心城市向县镇宣教的使徒性使命；其四、是承担影响主流社会及文化的君王性使命。

来的家庭教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会堂被毁、人被下监狱，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缓和了许多，但在不同的地区，仍有逼迫不时发生，被四处驱赶，毫无还手之力。长此以往必然在家庭教会当中积累对政府的敌视情绪，人的本性使然。

王怡的出现，给家庭教会指出了一个方向，通过法律维权的方式与政府抗争，不仅合法也行之有效。王怡先后扶持了基督徒律师团契，发布《家庭教会维权手册》，许多受逼迫的家庭教会必然视之如救命稻草。王怡每一次在讲道中骂政府，对解经来讲都是不必要的，但这会迎合家庭教会中的反政府情绪，同时得到“民运人士”的好感。有没有福音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怡代表了正义在批判一个地上的魔鬼代言人。今日中国，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有几个人不骂政府呢？这给了王怡丰富的群众基础。

2018 年 4 月，秋雨教会又发布了王怡撰写的《当警察来敲门（家庭教会版）》，称“这份文件不但反映了‘秋雨圣约教会’在政教关系和教会公开化的立场下，面对教案和逼迫所采取的‘非暴力不服从’的立场和指南。”近期，王怡还在不断加大手上的筹码，放大现有的政教冲突，以“殉道”刺激家庭教会走向正面对抗，以“叛教者”的罪名绑架有异议的教会。就在刚刚过去的 5·12 之后王怡发出一篇《派出所读经札记：以斯帖记》，其中写道，“末底改一人不向哈曼下跪，招致了全族灭绝的报复。不知当时，有多少犹太同胞，会吐唾沫把他淹死，戳脊梁把他戳死。这也与今日类似。危机来自不向哈曼下跪（叫你不要聚会你偏要聚会）。在某个意义上，末底改是自寻危机，自找威胁。在不信之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信仰上的“碰瓷”行为。然而，恰恰是这种“宁为玉碎”的忠信，同时带来了危机，也同时带来了胜利。”

王怡要的就是“玉碎”，就是自取刑罚，这将绑架所有中国家庭教会，将其推向政府的极端对立面。

如果王怡仍旧是王怡律师，他站出来推动公民运动、教会维权、社会转型，将是令人敬佩的；但作为牧师的王怡来做同样的事情，并且曲解圣经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将这一切包装成上帝的旨意，长此以往，会将将主的羊训练成革命党，并试图在地上实现基督王国，就是假教师的行径，背后是敌基督的灵。

追随耶稣的人当中，曾有人强逼耶稣作王，耶稣却远离他们（约翰福音 6:15），就算到了主复活之后，门徒还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却说那日子他们不能知道（使徒行转 1:6-7）。主也明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6）

然而，如今中国家庭教会面临如此的奋锐党人的试探，好像主的国就在这世界，要为主与君王争战，要“玉碎”，而不要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公民运动，不是推翻法老，不是自取刑罚，不是天天指责社会结构性的罪，而是天天省察自己的罪。

2018 年 5 月 15 日，王怡的秋雨教会发出《关于成都 5.12 教案的声明》，称“本教会决定， 为着福音和良心的缘故，我们将针对 5.12 教案，采取一系列检举、举报、 控告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等法律手段，也陆续发布相关法律行动的简讯。 来向社会、 政府和一切有着上帝形象和尊贵的人类，公开指出这迫害教会、 侵犯和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罪恶，不但是违背法治的，更加是上帝所憎恶的。 也藉此向涉案的成都市数千公务人员及全社会提出对这一邪恶罪行的、来自上帝和圣经的警告。”

想必王怡的圣经中也没有罗马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 12:18-19）

这篇声明无异于一封发给政府的“决战书”，必然在众多家庭教会中激发更大的殉道热情，同时向执政者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从现在到 6 月 4 日的这段时间事件，王怡必将如其所言，继续扩大这种张力。

既然秋雨教会 5·12 这天所发生的事都能在全球范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试想，如果将来的某天王怡被官方逮捕，那么秋雨教会和华西长老会的数千名基督徒，全国各地家庭教会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极有可能到各地政府的门口聚集，集体公开祷告、唱歌、诵读圣经，甚至绝食，要求政府释放王怡。

到那时，中国家庭教会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珐伦功，而王怡必将载入历史。作为资深的政治学者，这一切都是他可以预见的，然而他已经定意如此。

笔者在此呼吁，华人教会里，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们，无论你是牧师、传道人、同工，抑或是普通信徒，应当一齐起来，抵挡这一股强大的奋锐党的潮流（奋锐党的原意即为“狂热分子”），为了主的教会能够始终的见证超越的福音，为了避免有一天外邦人和教会的下一代都说“你们的信仰不过是一种政治观点”。

(二) 强调教会的生存，刻意低调，避免因为聚会、证道引起管理当局关注，对于时政讳莫如深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知和反智主义在此有很好生存空间

石衡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一文中写到：
中国家庭教会的现实处境是：不能公开，要尽量避免受到关注，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也难有机会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所以，作为一个团体，它与教育、医疗、慈善、养老、助残、福利等社会事业无缘。它没有公开的社会形象，没有公开的社会地位。关于它的情况得不到公开报道，关于它的研究也得不到出版与公布。只有在特殊的时期，它可能冒险参与，亮相社会，但也是在一定范围。如在"非典"流行时期，有些家庭教会向社区和团体发放防护和医药用品并发放福音单张，收到良好的效果。
家庭教会通常采取可以低调的方式运作，有其充分的道理，但这种低调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是教会成为少数人的教会。教会不打开大门的结果就是新来的每个人都是带来的，没有听到赞美诗推门进来的。另外就是教会在传统的助残、帮助孤儿寡母这些社会功能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教会封闭起来，走向极端就是把教会安全当成了偶像，为此众信徒行踪诡秘、小心翼翼也让旁人侧目。封闭的环境容易滋生无知和反智主义，而开放才能战胜无知和反智主义。

(三) 以圣经真理为准绳的家庭教会立会、牧会之道，教会传扬神的道，神的归神；鼓励信徒响应恩召努力工作，在社会上尽职尽责，凯撒的归凯撒。就神国和世界而言，神国是永恒的，世界是客旅，信徒要清心忍耐，热切盼望。

以我们所在教会为代表的家庭教会，在处境化中兼顾了圣经真理和文化的平衡。中国特色的处境是西方社会不能充分理解的，因此会陷入或者一味的批评，或者是视而不见，为处境唱赞歌。
我们教会过去在处境化方面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1. 重视家庭、婚恋

2012 年第 5 期《教会》杂志发表了《改变生命的婚恋事工—访谈高真牧师》。高牧师和东梅师母所做的事工一直坚持至今。最近 10 年，在教会结婚的弟兄姊妹都为这个事工做了美好的见证。
对于青少年从 13 岁—20 岁开始的婚前收贞辅导，非常重要，让青少年能够安然度过青春期，父母甚得安慰。对于已婚的人，婚姻辅导，夫妻营，夫妻团契、妻子团契、丈夫团契，对于家庭关系的恢复，建造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重视家庭建造收获了硕果，现在都是一家一家参加敬拜。这和美国教会里面父母对于子女信仰无力干预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家庭秩序也是井然，父母行使权柄，教养、管教自己的孩童。

2. 重视植堂

在《21 世纪教会成长学》第 29 章，讲解了活泼的自己植堂运动。同样的内容在《充满活力的教会植堂》[12]中也有介绍。植堂已经成为我们教会传福音的重要方式，并培养了更多的工人。

3. 重视门训

重视培养工人
卫道夫在《中国家庭教会治理中设立圣职的重要性》中指出：如此看来，训练高素质的工人是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的关键。可以这样说，如果工人的素质上不去，教会就算有了好的制度，按立了圣职，教会的制度也不会正常运作，教会也就不能健康地发展。因为教会牧师和长老不是从个人的愿望而来，而是从神的呼召而来；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工作，而是为了教会的发展、公众的需要去服事。[13]
玉汉钦牧师在《唤醒平信徒》一书中，更把训练门徒作为教会牧养的中心事工。
除了高老师持续不断地带领门训之外，各个堂的传道人也开始带领门训。从中兴起的全职服侍的传道人连绵不绝。

4. 传讲会众听得懂的福音，不回避罪

教会的会众各个堂点均有各自特点，但均有相当数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因此讲福音深入浅出非常重要。满足了会众对于福音真理的饥渴，喂养结合生活所需的细节，从圣经上给出激励和答案。

5. 特别重视教育

BGCS 一晃建校 10 年了，最高年级已经进入高中。

[12] 《教会》，2011 年第 6 期，总第 32 期
[13] 《教会》2012 年第一期

6. 大力差派宣教士

7. 不与政府对抗

8. 应对危机时的智慧、自省和悔改

(四) 一个有些异样的选择--家庭教会及会众参与商业

在教会里做生意，或者信徒之间做生意，抑或做基督徒的生意，都因为把信仰（白白地得来，白白地舍去）和生意（盈利）两个有内在逻辑冲突的事务扭在一起，结果往往不欢而散。

当一个为神全职服事的负责传道人眼中放光谈论生意时，大大地降低了他来自于神的威信。

三、 家庭教会从处境化中走向未来

(一) 家庭教会的因应

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众多环境，文化的纷繁复杂的内容，都需要思考并应对。教会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对于各样的文化因素，都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采用了趋利避害或者积极进取的互动。举例如下：

1、和管理当局的互动。从躲避、硬抗到正面接触。
2、证道集中于圣经真理，不在政治和敏感事件上引申。
3、明确教会规定，不参与商业活动，禁止弟兄之间借贷，避免世界上的纠纷造成软弱跌倒；
4、制订领会等服事的规则，通过仪式感实现教会内部的一致性。
5、通过查经小组了解信徒最新情况，及时通过探访、交通分享帮助信徒，避免羊走丢。
6、通过信徒大会形式，公开财务情况和事工情况。
7、逐步建立长老会治理模式，民主管理。
8、通过植堂形式促进传道人不断成长，在证道，牧养，治理方面不断更新和提升。
9、维持和房东、物业、当地管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的正常沟通，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不扰民。
10、对于信徒情况保守秘密，在引用例证时注意脱密，避免引起不适和反感。

(二) 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是城市教会植堂的深谋远虑之举。

下一代如何，已经是重中之重。信仰危机在 21 世纪会越来越深重，这会是全球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发展、对于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价值担忧的蔓延、物质主义、多元化和世俗化的深入，基督教信仰会越来越不为世界所容，甚至从多数信仰变成少数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坚定，装备齐全，有童子功的一代工人会勇担重担。